

多和吴晗等人，还同他们共进晚餐。”

这些看似普通且平凡的回忆，却见证了抗战时期清华人忧国忧民，为民族的未来悉心办教育的情景。

在办学过程中，盟军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个年代，一座边远的村庄，信息和文化生活是匮乏的，但美军军营的报刊、杂志、画报等，都敞开向学校提供；特别是军营播放电影，都允许师生前往观看，有时还到村民家中领小孩子们去看，黑夜中又打着手电送回家。那时世界各地

的反法西斯战况，我们都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信息。在美军回国前，他们还为“建国中学”、“恩光小学”提供了大量运动器材和物资。缅甸战况吃紧时，大批华侨子女，其中有许多是孤儿，来到新村，被安置在恩光小学学习、生活。美军提供了部分生活用品，特别醒目的是，不分大小，发给他们每人一件羊皮的带白绒毛的飞行员夹克。

作者李靖森为清华1922级老学长李吟秋先生五子，北京建工学院教授，已退休

童年记忆中的叙永之行

○袁 刚

在联大九年的历史中，叙永分校存在时间不到一年，教职员为数不多，学生也仅是大学一年级的600多人。叙永的办学条件比昆明更差，生活条件比昆明更艰苦。但全体师生依旧满怀报国热情，教师坚持传道授业，学生勤奋学习发扬着联大“刚毅坚卓”的精神。

1940年父亲袁复礼受命至四川叙永分校任教，全家随行。叙永之行是我家抗战时期生活最艰苦，最动荡的时期，也是得到亲友、同事和学生帮助照顾最多的时

期，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同赴国难共度时艰的不屈精神。当年我虽只有7岁，但至今对这些颠沛流离的日子仍记忆犹新。

去四川以前我家住昆明灯华街25号，这里接近五华山云南省政府驻地，是日本



1939年袁复礼先生与子女摄于昆明大观楼

□ 联大春秋

飞机轰炸的重点地段，很不安全，孩子多，逃警报太困难。父母商议结果：父亲一人留守城里教书，母亲和李妈（她是我家从北京逃难出来时带的保姆，为人忠厚，虽不识字但非常能干，吃苦耐劳，抗战八年一直和我们同甘共苦）带五个小孩躲到远郊，在西山脚下高桥租了一间民房居住。每隔一段时间要进城取钱、衣服和日用品，交通不便只有木船，母亲和李妈总是天蒙蒙亮就出发，到天黑才能赶回高桥。中午房东太太照顾我们吃饭，下午我和弟妹们望眼欲穿的盼着母亲归来。大约半年后才搬回城里。

深秋时节父母带着六个孩子开始从昆明踏上去叙永的长征。当时哥哥最大，14岁，但是他因幼时患大脑炎落下后遗症，成为智障人，需要特别照顾。大姐13岁是个顶用的人，我7岁多、妹妹6岁、大弟弟不满5岁、小弟弟3岁。幸亏有李妈随行，沿路照顾，使我们少吃许多苦头。

从昆明到叙永的行程要绕一个大圈：乘汽车从昆明起程经曲靖、富源、晴隆、安顺、贵阳、遵义到重庆，改乘轮船到泸州，再坐小木船到叙永。

从昆明上车就不顺利，清早赶到汽车站，父亲的学生来送行。我们在雨中等车，两个多小时未能成行，三天后才顺利登上运货大卡车，下面箱子装货，铺上草帘子上面坐人，全家9口在草帘上或坐或卧，母亲晕车，常常躺着。上下车时将4个小孩子都是抱上抱下。货车均结队而行，以防沿途土匪抢劫。车队在滇黔川的群山峻岭中缓慢爬行，公路一边是万丈深渊，另一边是陡峭石壁，曾多次看到山坳里出事掉下去的汽车和货物，真是惊心动

魄。路况极差，汽车常常抛锚，走走停停。每晚住的多是路边临时搭建的简易旅店，只提供板床和少量陈旧肮脏的被褥。因此每晚要从卡车上将自己铺盖搬下来打开睡觉。次日天蒙蒙亮起身，先打好行李，放到油布里包上捆好搬上卡车再匆忙吃早饭。

时值深秋，经常下雨，车停后在雨中找饭馆找旅店，我们每人仅有的一双布鞋总是湿的，晚上在旅店炭火盆边烘烤，满屋都是鞋臭味，次日穿时鞋总是潮的。

整整走了15天才到重庆，九口难民风尘仆仆投宿我六姨家。六姨家也是从上海逃难至重庆的，有五个子女，年龄和我们相差无几。姐妹们乱世相逢，悲喜交加。六姨热情接待，腾出一间房子，全家打地铺。最糟糕的是我们全身和头发都长了虱子。母亲和李妈把全家内外衣服和被褥洗后用开水烫过。男孩全部剃光头，女孩剪男式短发用药水洗。在六姨家舒舒服服休整了十多天，大姐作为南开中学的借读生留在重庆，父母带我们五人乘江轮到泸州，转乘小木船沿长江小支流永宁河逆流而上去叙永。在漆黑的夜里，四周寂静，只听见船桨打水声，不久我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已躺在叙永家里床上。这一夜不知父母和李妈多么辛苦，把我们和那么多行李弄到新居。从昆明到叙永费时整一个月，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在叙永我们住在联大租下来的大院中，进大门两间接一间，住着联大教职员共约十户人家。我家住最里边一间大屋子，紧邻是吴之椿教授一家四口。孩子吴小椿、吴小薇与我的两个弟弟年龄相仿，是我们亲密的玩伴。我家正对面住西

语系助教王佐良夫妇，王太太很能干，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不像我家人多杂乱。吴晗教授和太太袁震住斜对面一间小房子，吴太太有病，总是躺在床上，从不出房门，我们也不去他家打扰。吴晗喜欢小孩，常在院子里逗两家小孩子玩。他和父亲谈得来，常到我家聊天，曾和父母商议想把弟弟过继给他或认做干儿子，母亲舍不得，没同意。

叙永是川南落后闭塞的小县，没有电灯，在粗陶瓷小灯碗中放菜油，点上根细灯草照明，灯光昏暗。从院子后门出去可以下到河边，小河水清，可洗米、洗菜（上游）、洗衣服（中游）、倒马桶（下游）。

我和妹妹该上学了，叙永县城仅有的一所小学在河对岸的一座破庙中，坐小木船摆渡过河爬上高台阶就到，离家不远。学校条件差，教室昏暗，母亲认为我们才六、七岁，每天来回摆渡太不安全，干脆在家由母亲教算术、父亲教语文。根本没有任何教科书和参考书，由母亲自己出题做加减乘除，背九九口诀。父亲则根据记忆写下诗词让我俩背诵。1941年，夏抗战形势稍有好转，西南联大叙永分校撤销。全家再次乘运货卡车返回昆明。这次走近路由叙永直接南下，经毕节、威宁、宣威、曲靖到昆明，只走了六天。回到昆明无房可住，九口人只得借住在俄籍教授噶邦福家。当时噶家租住翠湖边上的一小花园洋房，有两间屋子，为接纳我家，他家四口人（噶太太、噶太太母亲和女儿噶维达）挤到楼上一小屋住，让出楼下一小间给我家住，房间很小，把褥子在地下一铺就占满全房。噶邦福原是俄国贵族，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十月革命后滞留中国，

1931年起在清华大学教授历史，抗战爆发他全家辗转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噶先生不懂中文，用英语讲课。母亲是满清政府派往沙皇俄国学习的幼童，不到十岁即到哈尔滨（当时俄国的势力范围），住俄国上校家中，上俄国学校，因此能说一口流利纯正的俄语。由于和母亲语言相通，开始交往，逐渐成为好朋友，是我家在昆明来往密切的朋友之一。

母亲外出奔波，想在城内租房，但每日败兴而归，几家合适的屋主一听家里有六个孩子，立即摇头拒租。十多天过去，我家只好搬到郊外黄土坡新村。那是一片新盖的简易房，土坯墙、茅草顶、泥地，四周是农由。这是抗战期间我家最差的住房。但总算安顿下来，重新置办家具炊具。我和弟妹也都进入小学，分别在一、二、三年级就读。

所谓的黄土坡小学，就两间土坯茅草房，两位老师，一间教室安排一、三、五年级学生，另一间教室是二、四、六年级学生。至今想起，我仍然很感谢和佩服那两位老师，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教书育人，使我们不致失学。隔壁住蔡维藩教授一家，他的两个女儿蔡丽茹、蔡建茹和我与妹妹同龄，上同一个小学，每天穿过农田一起上学、一起下学、一起游玩。

黄土坡进城的唯一交通工具是私人赶的马车。父亲每日清晨乘马车进城上班，黄昏有时乘车回家，但常常从联大翻两座小山包徒步返回。为防在荒郊野外遇坏人，他总是手拿地质锤防身。想搬进城，但租不到合适的房子。最后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解决了我家困难，将他家钱局街金鸡巷一号的房子租给我们。房子在大西门

□ 联大春秋

内，是个独家小院，四间房子，离西南联大很近，大姐上联大附中，我们四个小孩上联大附小，都很方便。

1942年夏天我家兴冲冲雇了八辆人力平板车，将家具炊具箱子装好，全家坐在箱子上，浩浩荡荡从黄土坡顺利到达金鸡巷。敲开门，满院满屋全是穿黄衣的军人。

最后我们挤进了梅贻琦校长家，住到西仓坡清华大学办事处楼上。我们称梅校长为五姑夫，五姑韩咏华是父亲的表姐。五姑腾出一间房子，全家又睡地铺了。梅三姐祖衫被挤出来，每晚只得爬到堂屋

高高的大台子上，带着我一头一脚睡一个被窝。我们住二楼，下面是清华的办事机关，母亲千叮万嘱：在屋子里走路要轻，不能跑，也不能在院子里玩闹而影响办公。我只好带着妹妹弟弟到办事处门外玩。紧挨门外有个刚遭轰炸不久的弹坑，有一人多深，我们每天沿弹坑转圈，从上到底、从底到上奔跑多次。

经父母多方交涉，约过了十天，大兵搬出，我们终于住进了新家。

住进金鸡巷后，虽然生活仍然艰辛，但已相对稳定。一住四年，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我们终于返回北京。

我们走在大路上

○史际平（1978级精仪）

“万里长征，辞去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这段西南联大校歌记述清华百年校史中曾经发生过一段动人心魄的历史事件。“七七事变”后，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南迁至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但同年12月南京失守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1938年2月临大师生分三路由长沙奔赴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其中一路由近300学生，11名老师（包括有闻一多、曾昭抡、吴征镒）和教官随队医生若干名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并由国民湖南政府领导人张治中委派的一位将军带队。这路人马自1938年2月20日由长沙出发，主要是依靠步行于4月底到达昆明。1946年，胡适

在西南联大纪念会上说：“临大决迁昆明，当时有最悲壮的一件事引得我很感动和注意：师生徒步，历68天之久，经整整三千余里之旅程。后来我把这些照片放大，散布全美。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好友杨嘉实（1977级力学）的尊翁杨式德（12级，1917—1976）和家父史国衡（11级，1912—1995），就是73年前的这支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队队伍中的学生成员。为此，嘉实兄和我在1996年前后就曾经议论过重走这条湘黔滇南迁之路，并得到过清华校友总会承宪康老师的鼓励和指教。可惜当年我们都刚到美国不久，整日